

---

# 孙科与战时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

王 真

---

孙科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亲苏派。抗战期间,他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身份积极开展对苏外交活动,对于调整和改善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西方有的学者把孙科称为蒋介石在对苏关系上的三个关键性顾问之一(另两人为蒋廷黻和杨杰)<sup>①</sup>。本文拟就孙科在这方面的活动作一评述。请同行教正。

—

1927年4月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出于当时国内反共需要,对苏联也采取敌视的立场,特别在1929年指使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挑起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断交。此后不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等要职的孙科,对蒋介石这种反苏是不满意的,认为中国不应因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而牵累中苏两国的邦交,“不可因清共而绝苏”<sup>②</sup>。在孙科看来,同曾对自己采取善邻政策并具有实力的大国绝交,实际上自我孤立,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他后来在总结检讨这段历史时说:“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十六年(1927年)没有反共绝苏的事件,两国能维持友好的革命外交关

---

① 参见约翰·W·加弗:《蒋介石请求苏联参加中日战争》(Chiang Kai-shek's Quest for Soviet Ent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War),《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卷102, No. 2第297页。

② 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13页。

系,以苏联为与国,也许敌人对我不敢妄动侵略。因为敌人知道已与其革命过程的唯一与国断绝关系,乃胆敢肆其侵略野心。”<sup>①</sup>显然,孙科是把中苏断交与九·一八事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失去苏联这个盟友是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富有权威性的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编著的《日本外交史》透露,石原莞尔等九·一八事变的导演者在确定其策谋计划时,是以即使日本进击北满,苏联也不会采取行动等因素为依据的<sup>②</sup>。当然,这种不采取行动与苏联当时奉行的不干涉政策有关,中苏关系的恶化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相当洞察力的孙科,以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极力主张中苏复交,以联苏制日。孙科等人的态度对于中苏两国在1932年12月复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苏复交后,由于蒋介石没有放弃对日妥协的立场,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重心放在依赖英、美等西方大国上,因此不可能进一步去改善中苏关系,实行两国间的合作。为改变这种局面,增进中苏友谊,孙科积极开展了一些工作。1935年夏,张西曼、王陆一、雷震、张炯等人以沟通中苏文化、发展两国邦交为宗旨,发起筹组中苏文化协会,但组建过程中遇到阻力,遂派人找到孙科,请他出面组建,孙科即表示同意。这样,中苏文化协会便很快建立起来。在10月25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孙科被选为会长。会后,孙又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希望得到赞助。苏联复电祝贺,表示愿意赠送苏联报刊和文艺作品,交流两国文化,发展两国关系。后来,孙科还推举了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象王昆仑、张冲等人担任协会常务理事,并指定王以常务理事名义代表他主持协会的会务,使协会发展。1937年3月,协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时,已有会员485人,抗战后期则猛增到5万多人。孙科对协会的工作也较重视,如在

---

① 《中苏关系》,第12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0页。

1938年12月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指出：“回顾过去本会成立之后的情况，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重大工作；对于一切计划，不能圆满充分执行；在中苏文化沟通和增进中苏关系上，还需要更加努力；希望本会现在的工作比过去所做到的效力要更伟大，希望本会同志共同努力，使本会的任务能够逐渐完成。”<sup>①</sup>也许由于这种自责和督促，协会的工作才能得到更好地开展；特别是在加强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和友谊上，进而在形成迫使蒋政府改善对苏关系的舆论压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这期间，孙科着力开展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努力促进中苏以条约的形式结盟。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过程。本来，中苏尚在进行复交谈判时，中方谈判代表颜惠庆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代表李维诺夫提出缔约的建议。苏方考虑到两国尚未复交，按国际惯例，条约应在复交后签订。所以，李维诺夫在1932年7月6日致函颜惠庆：“根据这一考虑，我谨通知您，一俟中苏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我国政府就准备着手同中华民国讨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sup>②</sup>然而，当中苏复交应讨论缔约问题时，中国政府反倒漠然置之，原先的那种主动性竟全然不见。相反，苏方则表现出其主动性，复交后仅3月余，便于1933年3月24日向中国政府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sup>③</sup>。这种易位使刚趋平静的中苏关系又掀起一个小小的波澜，实则反映出蒋介石在对苏关系上的矛盾心理：既想联苏又要媚日。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蒋介石没有放弃对日本的幻想。他在1934年12月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检讨》一文中说：“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

---

① 《抗战特刊》第3卷第4期，1939年1月。

②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致中华民国驻国联理事会代表颜惠庆函（1932年7月6日，日内瓦），《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第15卷，莫斯科1969年版，第401页。

③ 参见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记》，卷3第1册，第498页。

我们亦究竟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sup>①</sup> 据此,在 1935 至 1936 两年间,蒋十分热衷于对日谈判,以调整中日邦交。这样,蒋对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就不是那样急迫了,反而他还认为中苏关系进展过快,会因日苏矛盾而影响中日关系。历史表明,蒋介石对日妥协换来的只是日本侵华政策的变本加厉,日本以发动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全面侵华战争粉碎了蒋的幻想。对于蒋这种对日妥协而对苏冷漠的政策,孙科等人很有意见。1937 年 7 月 13 日,孙科以立法院长的身份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对蒋介石进行了批评,指出蒋在同苏联的关系上遵循“过为谨慎的政策”,而他和冯玉祥是想使中苏关系积极化的<sup>②</sup>。孙科甚至指责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说他没有蒋介石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孙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表示接受苏方的观点:中苏关系发展迟缓,以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苏条约尚未缔结,责任在中国方面。如前所述,孙科是一向主张中苏关系积极化的,卢沟桥事变后,他更为紧迫。事变后 10 多天中,他先后三次(7 月 9 日、13 日、16 日)约鲍格莫洛夫会谈,敦促中苏合作。他告诉鲍氏,他同蒋在形势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蒋认为卢沟桥事变引起的冲突只具有地方性并很快会消除,而他认为冲突规模会愈益扩大,有可能发展为中日间公开的战争<sup>③</sup>。所以,孙科更急于中苏缔约,以实现两国密切合作。

对于孙科这种积极性的建议,苏方自然十分欢迎。但在缔约的性质问题上,双方又有分歧。苏方的意见,是首先由中国政府发起达成一项太平洋沿岸诸大国的集体安全条约;如果不成,第二步是苏联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步才是与中国谈双边互助条约。苏的意图很清楚,此时它还不想以双边互助条约来介入中日冲突,而是想通过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来束缚日本手脚,如果日本不

---

① 《外交评论》第 3 卷,第 11、12 期合刊。

②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同中国立法院长孙科会谈记录》(1937 年 7 月 13 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 20 卷,莫斯科 1976 年版,第 375 页。

③ 同上。

肯加入条约,则可暴露其破坏和平之本性,并引起同其他国家矛盾,苏联再介入的理由更充足。中国政府的意见是马上缔结双边互助条约,这首先是蒋的意思。7月8日晨,蒋约孙科、王宠惠在庐山谈话时说,中国如欲抗战,“最有关系者为苏联军械供应及互助协定等问题的进行决定”<sup>①</sup>。蒋由不想缔约到立即要缔结互助条约,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毕竟反映出他已认识到中苏缔约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孙科认真执行了蒋的指示,会谈后即约鲍氏传达这一意见。但孙科又不是固执地要苏方接受蒋的观点,当鲍氏说明苏联为什么不同意缔结互助条约时,孙科便表示“理解”,并说将苏方的意思转达给中方的主要谈判者王宠惠。同时,孙科又细心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带头发起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指出日本是不会同意参加的,如果同意,则会以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为条件,中国当然也不会同意<sup>②</sup>。孙科认为,作为太平洋的美国,也不会参加。这一判断无疑也是正确的,因美当时正推行所谓中立政策,必然拒绝这种集体行动;美如此,英、法也就亦步亦趋。由于孙科意见的合理性,苏方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在随后的谈判中,中苏双方代表互作了让步,其结果,便是对双方意见的一个折衷性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苏结盟的最好形式,而孙科对此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 二

孙科在抗战初期的一项最主要的外交活动,就是争取苏联的援助。这是蒋介石要与苏联结盟的目的所在。为此,蒋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星期,即8月27日就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军事代表团飞赴莫斯科,洽谈军火援助事宜。杨杰在

---

① 《中苏关系》,第16页。

②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1937年7月16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385页。

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特别是中国急需的苏联飞机,得以迅速运抵。但杨所率的代表团毕竟是军事代表团,不便于开展广泛的、高层次的外交活动,杨本人也“不能谄晤斯大林先生”<sup>①</sup>。这就不利于进一步密切中苏关系。因此,蒋介石在1938至1939年间派立法院长孙科两次访苏,旨在通过高级会晤推进两国关系,争取更多的苏援。孙科作为中国高级领导人访苏,可以说是最恰当的人选,因为苏联对孙科有着良好的印象,这不仅由于与孙中山的关系,而且孙科本人是个亲苏派。

孙科第一次访苏是在1938年1月中旬。行前,蒋介石指示他要“对苏联安抚一番”<sup>②</sup>,意思是要说明中国不可能把苏联撇在一边同日本进行和谈,从而使苏联援助中国的立场坚定。孙科则对自己的使命充满信心,他“相信苏联是当时中国最真诚的朋友”<sup>③</sup>。

孙科取道西欧去苏联,于1月7日抵达莫斯科,在车站受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热情欢迎。抵莫斯科后的前几天,苏方先安排他列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进行了参观。1月21日,孙科同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会谈。斯托莫尼亚科夫首先称赞孙科对密切两国关系“富有成果的努力”。孙科说,他始终坚持这样的一种意见,就是中国和苏联应处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中,以便保障远东和平。如果两国努力在这方面更有成效,则日本不敢进攻中国。而日本之所以采取了军事行动,是考虑到西方国家过分忙于自己的问题,而不会给中国援助,同时也看到中苏关系不很密切,认为实施打击的时机是适宜的。孙科这番话显然突出了中苏关系对制约中日战争的重要性,无疑也是对蒋介石以往政策的一种批评。孙还说,中国人民在抗击侵略者时,从苏联的同情和支持方面获得了力量。他认为,如果这一援助将持续的话,中国胜利之日

---

① 《中苏关系》,第17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

③ 同上,第36页。

很快就会到来。斯托莫尼亚科夫则表示,苏联对中国人民确实充满着热烈的同情,热切希望他们取得胜利,并对中国近来军事形势的改善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表示满意。他还告诉孙科,日本最近对英、美船只的袭击,等于动员了英、美反日的社会舆论,这些对中国抗战都是有利的。在相互交换了对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后,孙科说,他受中国政府委托访苏的目的,就是搞清同苏联更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这种更密切的合作就是中国同苏联的合作不仅必须在现时,而且必须建立旨在稳定远东和平的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显然,孙科这里说的,不仅是就战时,而且还是从战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考虑发展中苏关系的。最后,孙科请求斯托莫尼亚科夫向斯大林和加里宁转交他带来的一些信件,并请求同这些领导人会谈。斯托莫尼亚科夫欣然允诺。

孙科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会谈加强了中苏间的友谊与合作的气氛,但实质性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他同最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至2月初,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党政军首脑才会见了孙科。在会见中,双方推心置腹,畅言无隐。特别是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推崇备至,并对中国将士和民众表示无限敬意。斯大林对孙科说:“如果中国竭尽全力抗战,就不会因临时的受挫和国土被敌占领而沮丧,这样最后的胜利必定是中国的。”<sup>①</sup> 斯大林这些鼓舞人心的言辞使孙科极度兴奋,两人竟从午夜畅谈至凌晨而无倦意。在这次会晤中,孙科的最大收获是融洽了与斯大林的感情,当然也是中苏间的感情,从而更有利于争取苏援。

与斯大林会晤后,2月9日孙科又与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主要是由李维诺夫通报国联日内瓦会议有关远东问题的情况。当时中国政府要求国联采取措施制裁日本,西方国家都优柔寡断,意见不一。李维诺夫认为,美国的立场是关键,而美国还不想实行

---

①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A History Sino--Russian Relations),华盛顿1957年版,第213页。

制裁,使西方国家难以协调行动。他建议中国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影响美国的舆论。孙科对苏联的支持表示感激,并认定“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sup>①</sup>。会谈结束时,孙科透露,中国政府打算任命新的驻苏大使,并请李维诺夫提出一些候选人。李维诺夫告知,苏联想提议孙科为大使。孙科听后自然高兴。当然蒋介石不会同意由立法院长出任大使,但苏联对孙科的信任却再次得到证实。

2月中旬,孙科去列宁格勒进行了访问,旋即返回莫斯科参加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纪念,尔后于3月初来到巴黎,对法国展开抗战外交活动。

孙科到巴黎不久,便接到杨杰来电,催其回莫斯科。原来,苏联对中国的第一笔贷款已用完<sup>②</sup>,蒋介石电令杨杰速商订第二笔贷款。因杨杰当时身份仍为军方代表,不能直接会晤斯大林,故需孙科来商谈。孙科返回莫斯科后,立即晤见斯大林。据孙科回忆,斯大林说,中国借款已超过中国法币1亿元,可将第一次借款改作5千万美元,相当于2亿元法币,同时再给予第二次借款5千万美元<sup>③</sup>。斯大林的慷慨解囊及时帮助中国解决了用贷款购买军火的问题。孙科成交这两笔贷款后便重返巴黎,合同签字事宜均由杨杰办理。孙科第一次访苏使命也至此完成。<sup>④</sup>他重返巴黎后曾对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说,他从莫斯科得到一笔新的1亿6千万卢布的贷款(指第二笔5千万美元合同——笔者),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订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折算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sup>⑤</sup>。苏联对中国的这种慷慨援助显然与孙科在对苏外交上

---

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同立法院长孙科会谈记录》(1938年2月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1卷,莫斯科1977年版,第69页。

② 实际上苏联当时是军火供应在先,贷款协定签订在后,杨杰来电时,军火用款已超过1亿中国法币。

③ 参见《中苏关系》,第17页。

④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3卷,第136页。

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孙科第二次访苏是在1939年春,其主要目的是商洽苏联援华第三笔贷款和签订中苏商约。3月底从重庆启程,4月7日抵达莫斯科。此时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吸引着苏联政府的主要注意力;英法代表团也正频繁活动于莫斯科谈判缔结军事协定,所以孙科与苏联首脑会见不象前次那样顺利。8日,孙科首先拜访李维诺夫。李维诺夫答应可向斯大林转达会见请求,并转交有关商洽事项的文件。之后,孙科又晤见此间正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涅兹—奥尔斯基,催约见日期。卢氏告知,斯大林、莫洛托夫正在出巡,须等待归来再定。20日,孙科再访卢氏,被告知斯大林已回,但未定约期。孙提出会见伏罗希洛夫,但被告知患病,一时不能会谈。28日,孙科只好重访李维诺夫,并请转交蒋介石致斯大林电文,以求其答复。5月5日、8日,孙科又两次通过卢干涅兹—奥尔斯基想求见莫洛托夫,但回话莫洛托夫因新就外长一职,众务繁忙。孙科经几番周折,仍未能会晤苏联首脑,心中难免有几分焦急,遂将此情电告蒋介石。蒋回电孙科:“苏俄忽变态度,殊出意外,但无论其如何变迁,我方必照固定方针进行,即使其不予接济,而我亦不以为意。以我国对俄之外交方针,并不以其是否接济为取舍,请兄忍耐进行,继续交涉,以期有成。”<sup>①</sup> 蒋这样回电,因为他已得到传闻:苏德正通过谈判达成谅解,并以不援华抗战为条件。此时虽真伪难辨,但蒋感到这必会影响苏联对华政策。不论如何,蒋的基本方针,还是要继续争取苏援,故有“请兄忍耐进行”一说。

这样,孙科在第二次访苏的前些天,无甚成果,只是在4月8日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进行了一次较为详细的会谈。会谈中,孙科开诚布公地说,他这次来莫斯科的目的是请求苏联政府更为广泛和有效地帮助中国同日本侵略者斗争。为避免有乞求之

---

<sup>①</sup>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台湾1981年版,第412页。

嫌,孙科解释说,中国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对付敌人,但因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苏援之所以必须,就在于它可以加速战胜日本。关于苏援的形式,孙科提出两点:一是向中国提供为其顺利进行对日斗争所必须的物质资料,二是苏联政府可以首倡援助中国的国际计划。他此行很重要的一点要同苏联政府明确援华的具体途径问题,并告知他随身携带着蒋介石给斯大林的信,同斯大林会晤时将详细说明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使其确信从物质、士气和政治等方面援华的必要性。孙科还提出苏援的三个具体问题,即建立中苏定期航空联系,组织开采中国石油,建设连接中国西部和苏联的铁路<sup>①</sup>。波将金细心倾听了孙科的意见,但没有也不可能表态。

孙科盼与斯大林会晤数周后才实现。此次会晤虽姗姗来迟,但斯大林对援华贷款却是痛快淋漓的。他同孙会晤了一个小时,询问了中国抗战情形,便欣然同意可向中国提供第三笔贷款1亿5千万美元,表示“苏联极愿照办,没有什么问题”<sup>②</sup>,并嘱苏联对外贸易委员米高扬同孙科签订合同。这样,孙科在贷款问题上终于取得圆满结果。

孙科第二次访苏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签订中苏商约。中苏商约问题早在苏复交后不久,即1933年5月8日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同当时的中国外长罗文干会谈时就提出来了,罗文干表示同意缔结该约<sup>③</sup>。但因蒋介石在发展中苏关系方面举棋不定,而当时主持行政院的汪精卫等人又从中阻挠,所以迟未缔结。抗战爆发后,苏联大力援华,中国也需用有关物品偿还苏联贷款,双方经贸往来频繁,迫切需有一商业性条约,以利经贸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孙科这次赴苏前,国民政府就已拟好缔约的有关条件,让其携带前往。孙科在与斯大林会晤时,亦谈及缔结商约一事。斯大林当

---

① 参见《危机的年代 1938—1939 年文件和材料》(Год кризиса, 1938—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卷1,莫斯科1990年版,第363—364页。

② 《中苏关系》,第17页。

③ 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注118,莫斯科,1973年版,第638页。

即嘱米高扬同孙科具体洽谈此事,“更表示希望中苏商约能早日成功。”<sup>①</sup>

孙科将中方拟就的商约草案交给米高扬后,苏方研究了数星期,并提出一修正案。主要修正点,一是商约名称,苏方意为中苏通商航海条约,二是苏联要求在中国首都设立商务代办处,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兰州五地设立分处。孙科接受了此项修正案(商约名称最后仍定名为《通商条约》),但指出根据互惠原则,中国亦可在苏联有此项同样权利。然而,孙科实际上又不主张中国在苏联设立商务代办处。他认为苏联贸易系国营事业,代表苏联政府在中国办理一切贸易,除易货外,还可以政府名义收购其他货物;而中国主要是办理易货,在大使馆内设立商务参赞即可,况且欧美各国无一在苏设立商务代办处。孙科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苏方亦同意这一看法。因此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私营贸易,政府无法统制,且早已有之<sup>②</sup>。基于上述考虑,孙科接受苏方意见,并根据中国政府授予其全权,于6月17日在商约文本上签字<sup>③</sup>,苏方签字者为米高扬。条约有效期为3年。同时签订的还有条约附件《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驻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之法律地位》,以及条约的换文。签约当天,孙科电蒋:“商约内容,均系互惠。惟苏方提案,系规定苏联有在中国首都设立商务代表处之权,并可在天津、广州、上海、汉口、兰州设立分处。而关于中国方面,则未提及。科当根据互惠原则,要求中国在苏联亦有此项同样权利。”但继而孙科又说明中苏因贸易方式不同,“中国在苏联事实上无设立商务代

---

① 《中苏关系》,第18页。

② 20至30年代,上海、广州、香港的一些中国大公司都想与苏联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国民政府虽不支持,亦无法阻止。参见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年》(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莫斯科1979年版,第111页。

③ 据《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413页。一说签字为6月16日,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39页。

表处之必要”<sup>①</sup>。这番解释显然是怕蒋说条约不互惠而放弃了应有的权利,而要蒋知道实际上无必要运用这项权利。电文最后说:“科意我国抗战,苏联援助独多,缔结商约为表示中苏作进一步之提携。且苏联在重庆使馆内已设立商务代表处办理中苏易货事宜,并已在兰州设立分处,约中明白规定并亦系根据既成事实,于我国当不致有何不便,故即同意照办。”<sup>②</sup>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允苏在中国设立商务代办处的理由,虽带有先斩后奏之意,但孙科既被赋予签约权,条约又无伤主权,故蒋介石未复电提出异议。

中苏商约共 15 条。条约主要规定双方货物进出口时,其关税不得异于或低于第三国待遇,不得设立不适用于来自任何第三国同样货物之任何禁令和限制,易货需经该国所设关卡之商埠,而不得私运等。以商约内容看,确系平等互惠之条约。条约签订后,孙科原与苏方商定于 6 月 25 日在重庆和莫斯科同时公布。苏联如约照办,但中国方面当时没有公布。据孙科说,是“因恐旁的国家或起误会”<sup>③</sup>。这可能是指英、美等国。因为商约允苏在中国设商务代办处,比照英、美毕竟是一种优惠。蒋介石不想因此而开罪于英、美,尽管英、美当时援华甚少。后来,美国还是在兰州设立了领事馆(相当于苏联商务办事处)。

苏联政府把签订商约看作是发展中苏关系的一件大事。6 月 24 日,莫洛托夫特举行招待会,庆祝中苏商约缔结,苏联党政首脑均出席,“精诚亲善,得未曾有”<sup>④</sup>。可见,商约的签订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高潮。正如孙科所说:“商约签订以后,双方根据合约进行,几年间,关系相当好转。”<sup>⑤</sup>这也是抗战期间孙科在对苏外交方面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

---

① 《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 413 页。

② 同上，第 414 页。

③ 《中苏关系》，第 18 页。

④ 《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 423 页。

⑤ 《中苏关系》，第 18 页。

### 三

孙科在抗战期间对苏外交工作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积极参与蒋介石外交决策,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关键性顾问”作用。

抗战期间中苏关系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欧洲局势的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很大,这在1939年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蒋介石很重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以决定其对苏外交的政策。孙科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和关键性顾问,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他第二次访苏期间,正值欧洲局势动荡之际。为对付希特勒德国侵略的威胁,英、法、苏三国正进行缔结同盟的谈判,同时又传闻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同样也要达成某种妥协,这使本来动荡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为弄清这些情况以及它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孙科在争取到苏联援华的第三笔贷款后,又在苏联逗留了一段时间。1939年8月27日,孙科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孙科就问,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将对远东事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洛佐夫斯基援引日本报界的言论说,这一条约粉碎了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并孤立了日本,因此他认为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孙科说,现在有两个问题使中国人感到忧虑,一是传说苏日要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二是传闻英日可能要达成协议。孙科认为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观点来看,这对我们是有某种不利的:如果苏日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不可避免地要削弱苏联对华援助;如果英日达成协议,那末中国赖以从欧洲获取装备的一些港口将因此而关闭。洛佐夫斯基说,英日关系如何发展将难以预料,不乏英日达成妥协的可能。至于苏日互不侵犯协定,对此全无所闻,有一段时间苏联曾提议日本缔结该协定<sup>①</sup>,但日本拒绝了,现在这一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这种回答既是巧妙的推脱,又为尔后缔结协定留有余地。进而,洛佐夫

---

① 苏联在1931—1933年曾两次主动向日本提出签订中立条约的问题。

斯基又反问孙科，中国战场为什么近来平静下来。孙科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武器供应不足，英国虽然答应贷款 300 万英镑购买武器，但一直拖延协定的缔结；美国虽然同中国进行贸易，但不愿向日本施加经济压力，争取援助愈来愈难了。意即还要指望苏联的援助。也许孙科看出洛佐夫斯基总是想尽可能回避苏日缔约这一敏感问题，所以在会谈结束时又有意回到这一话题上来，问及苏日是否因北库页岛租让问题在继续冲突。回答磨擦是有的，但部分地得到解决。孙科最后又强调说，中国人忧虑苏日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和英国可能达成妥协，从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的观点看，是很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物的。

孙科从与洛佐夫斯基的会谈中，虽然在苏德、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等重要问题上未能获取准确的情报，实际上也很难获取，但起码了解到这方面的动向，这对预测未来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苏联外交政策的走势无疑是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孙科代表中国政府预先阐明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对苏联在外交关系上这些重大举措的立场，即提醒苏联注意不要因此而影响援华抗战。不管这种表示后来实际上是否起作用，却促使苏联在调整其外交格局中不能忽视对华关系的因素。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虽然逐步减少但并未中止对华援助，其苏联军事顾问在华一直工作到 1942 年初，恐怕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这次会谈后数月，以德国大举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为起点，欧战全面爆发。这一新形势使孙科更为繁忙起来。9 月 4 日，蒋介石即电孙科，嘱其向斯大林探讨苏联对欧作战方针。电报说：“英已宣战，欧战既启，苏联对欧战方针如何？务望面询史大林先生明示底细。以中之意，此时如何使日本孤立而使英、美不援日本，是为中、苏共同之政策，务望于此特别注意。请速见史大林先生后，盼速复。”<sup>①</sup>但时隔一周，尚未接孙电，蒋便在 11 日又电孙，要其速见斯

---

<sup>①</sup> 《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 428 页。

大林,探明苏联在远东是否愿与英、美、法合作,“能密以告我”,同时告知中国对欧战态度的一般倾向是“不主参战”,“然尚未决定”<sup>①</sup>。9月13日,孙科复电,说未及谒斯大林,但已面托米高扬代约。电中孙科就其所见谈到,苏联不愿卷入欧战漩涡,“乃毅然和德保持中立,静观时变”;“苏对远东援我抗倭方针未变,如美、英、法亦能事实上执行援华制日政策,苏方当可一致。”关于中国对欧战态度,孙科认为“似以中立为宜”,除非英、法能予我大量器械援助,并对日彻底不妥协<sup>②</sup>。孙科复电客观反映了苏联对欧战和远东的政策,其看法虽非直接出自苏联领导人之口,但判断是准确的,尤其是中国不宜参加欧战的建议,对蒋的决策更具参考价值。关于苏日关系动向,孙科也及时报告并提出对策。9月16日,苏日在莫斯科签订诺门坎停战协定。次日,孙科即电蒋,告知该协定内容与去年8月间签订的张鼓峰停战协定内容相同,但提醒:“恐倭或将乘时改变仇苏政策,必进一步和苏企图,我宜注意应付。”<sup>③</sup>9月17日晚,米高扬约见孙科,告诉斯大林近日政务繁忙,无暇约会,但对蒋介石最为关心的苏联援华政策,米高扬表示不变。18日,孙科就此电蒋:“苏联援助中国抗战,自当继续以事实表现,决不稍变初衷,请我切勿怀疑误会。”<sup>④</sup> 这起码给蒋介石吃下一颗定心丸。

在苏联对华政策中,蒋介石尤为关注的一点是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问题。然而,蒋介石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反差太大,孙科在这方面则注意对蒋进行心理和政策上的调整。本来,孙科也是主张苏联对日参战的。在蒋介石的三个对苏关系顾问中,只有蒋廷黻比较早地意识到苏联当时是不可能参战的,但这种看法却遭到谴责,包括孙科,都说这是“误解苏联的意图”<sup>⑤</sup>,断言苏联必能参战。不

---

① 《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429页。

② 同上,第430页。

③ 同上,第431页。

④ 同上,第432页。

⑤ 《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仅如此,孙科本人还直接向苏联方面提出过参战的请求。例如,1937年7月28日,孙科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就提出,如果目前危机增长的话,苏联能否将军队向满洲边境进行某种调动<sup>①</sup>,意思要苏联进入准参战状态。当然这遭到拒绝。孙科对苏参战问题认识的转变是在他访苏过程上。他到苏联后,通过与苏领导人会谈,以及实际考察,方知蒋廷黻所言为实。1938年2月7日,孙科从莫斯科电告蒋介石:“苏联愿始终相助,促我胜利,但若须立即参战,则以国际时机未至,仍留有待,俟时机成熟,如经国联决议制裁,至少亦得英、法、美与苏一致,始能动兵。此时若苏独自出兵,恐将促成日本上下团结,促进德、意更积极助日,分裂国际对我同情,引起苏联助我赤化误会,反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sup>②</sup>孙科的报告反映了苏联参战需受多种国际因素制约的情况,确实对蒋有一定的说服力。以后,蒋的态度果然有些变化,这就是他对张鼓峰事件的反应。1938年7月,日军出动7千余人在中、苏、朝交界的张鼓峰地区向苏联进行军事挑衅,结果遭致惨败,被迫要求停战。在事件尚未结束时,国民党政府的不少官员认为该事件是苏日战争开始的信号,即刻燃起苏军参战的希望。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表示赞成蒋廷黻以往的看法,说中国应一如既往仿佛没有发生这一事件。蒋廷黻认为,如果说蒋介石以前对苏联参战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这时已明显放弃了这一幻想<sup>③</sup>。蒋介石希望苏联参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英、美这种舆论影响的结果。苏联对英、美企图挑起苏日战争的做法很反感,孙科访苏期间了解到这一情况,也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报告。1939年9月17日,他在给蒋的电报中说:“苏联对倭取严防痛击态度。但若倭知难而退,不再挑衅,苏只求保境息争,亦无与倭决战决心,故在远东,苏对美、英亦严防中计,不愿发动苏倭战争,我

---

① 参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724页注165。

② 《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407页。

③ 参见《蒋廷黻回忆录》,第211页。当然,蒋廷黻的这种说法有言过其实之处,因为后来蒋介石还是有要苏联参战的念头,如在武汉会战期间又提出这种要求。

与彼接洽,切忌要求参战,转移中倭战争为苏倭战争。以科愚见,苏援我程度,似限于器械供给与技术协助,若求其仗义参战,解决战局,恐不可能,即对远东望其与美、英、法合作,彼多疑,必虑美、英目的在挑起苏倭战争,以解美、英、法在远东所受之威胁,必美、英先有对倭积极制裁之行动表示,苏方始能相信而乐于合作,否则彼将疑我信赖美、英,怪彼援我不力,或疑我暗代美、英刺探彼中秘密,反于合作前途有损无益。”<sup>①</sup>应当说,孙科的这种分析是相当清晰透彻的,从苏联与列强关系的全局上晓蒋以苏参战的利害,明确我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总的来看,孙科的意见还是对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要苏参战的热情有所降温。当然,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态度,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蒋把外交政策的重心转到美国方面以后。

然而,也正是从这以后,中苏关系逐渐冷漠并导致恶化。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盛世才反苏反共并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孙科对此很有看法,认为两国关系应当尽快正常化。对破坏中苏关系负有重要责任的盛世才,孙科予以了谴责,这从曾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等要职的唐纵的日记中可看出。1944年4月13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新疆事件发生后,党内同志对盛世才颇有责难,孙哲生(孙科字——引者)、邵力子二先生持论至为显著。”<sup>②</sup>惯于独裁的蒋介石是不喜欢别人批评他的政策的,当然包括他支持盛世才反苏的政策。对此,孙科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公然指斥党内之不民主,许多弱点,并且要求公开发表”<sup>③</sup>。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王芃生等人均不满意中苏关系恶化的状况,国民政府军令部甚至明确提出应设法调整人事,盛世才

---

① 《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第431—432页。

②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

③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

须调离新疆,另派他职。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加之此间美国对中苏关系的调解<sup>①</sup>,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9月解除了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将其调离新疆,改任国民政府农村部长。这一举措对缓和在中苏在新疆地区的矛盾和改善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它表明蒋介石毕竟接受了孙科等人的正确意见,尽管这不是很情愿的。

孙科认为不仅要迅速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状况,而且应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两国关系的意义。在孙科看来,中国方面应摒弃错误的“远交近攻”的传统观念,而实行“远交近亲”,即实行亲苏政策。他指出:“一定要和苏联亲善,永远保持亲善密切的关系,然后中国的复建国,长治久安才有最大的把握。”<sup>②</sup>这种从战后更长远的利益上看待发展中苏关系的重要性显然更具有政治家的眼光。抗战结束前夕,孙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上专门作了关于中苏关系的演讲,来宣传他的这一观点。他回顾了自十月革命以来中苏关系发展的历程,总结了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的经验教训,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今后我们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是亲善提携的政策,希望各位同志能确切认识我们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前途,致力中苏邦交之亲善。”<sup>③</sup>孙科的这些主张对抗战后期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943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大会政治报告在谈到以往中苏关系时给予了肯定,指出,苏联在抗战初期即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并订立三次信用贷款协定,为订购苏联军械飞机之用,“苏联自苏德开战后,虽难再以物资假我,但相互之间同情日增,一本以往友好精神,多方觅取途径,以加强双方关系”<sup>④</sup>。这种缓和的语气与蒋介石在中苏

---

①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调解中苏关系,指出“盛是中苏合作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见《中俄关系史》,第179页。

② 《中苏关系》第22页。

③ 《中苏关系》第22—23页。

④ 《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总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726页。

关系恶化之际的持论显然不同,确可看出蒋在对苏联策上的某些转变。其后不久,中苏通过莫斯科谈判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即可说明这一点。

#### 四

孙科主张亲苏联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对孙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作为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标志着孙中山思想上的深刻转变。孙中山这一新的立场和观点,对孙科的影响是巨大的。抗战期间,在孙科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中,就多次提到这一点。1940年3月12日,孙科在英文版的《自由与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国父与苏联》一文,就专门阐述了孙中山的联苏政策。文中在引用孙中山遗嘱里说的“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这段话之后说:“这封具世界历史意义的国际遗书,真是前所没有,为人类指示出创造新世界的平坦大路。”<sup>①</sup>孙科认为自己只有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遗嘱,方可报效国家。正如他在该文中指出:“我们今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怎样由抗战建国中,实现国父伟大的革命目的,完成三民主义,以强盛独立的国家力量,与苏联携手,并联合其他的友邦,去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的最后胜利。”<sup>②</sup>

孙科认为,联苏不仅是实现孙中山伟大革命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孙中山一个最基本的外交政策。1941年10月11日,他在中苏文协香港分会主办的演讲会上谈到,孙中山生前说过,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是否有当,实有密切关系,所

---

① 《中苏关系》第2页。

② 《中苏关系》第3页。

谓“有当”，其基本精神在于敦睦邻邦。中国的主要邻国有二：日本和苏联。“我们的敌人是谁？还不是国父身前早就警戒着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朋友是谁？我们的朋友是众多的，其中最主要之一，就是国父早就明确地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sup>①</sup> 孙科还指出，孙中山主张外交上联苏，反映了“他有远大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对此，孙科用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华的友善政策作了说明，并得出结论：“总之，苏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两大邦国都有极崇高的理想，立国之本复大同而小异；并且边境相接为世界最长之一，此所以两大革命领袖列宁先生与国父之要把彼此未来的命运，放在密切提携上面的缘故。后之者恪守不懈，两国的邦交，乃能日益敦睦。”<sup>②</sup> 这就是孙科亲苏之思想本源。

其次，孙科把苏联视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典范。孙科认为，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面临着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在民族问题上，对内它要使国内 100 个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的民族相安，对外要扶助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谋求解放；在民主问题上，它要由沙皇专制政治过渡到全民民主政治；在民生问题上，它要由贵族大地主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共有共享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三个问题，苏联经过 20 多年的革命奋斗，“终于把它一一完满地解决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sup>③</sup>。因此，在孙科看来，苏联已经实现了三民主义理想，很值得中国效法。孙科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三民主义革命，显然是不对的，但苏联解决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毕竟是事实，因此，孙科的看法又是有道理的。当然，孙科也知道苏联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他认为三民主义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冲突”，因为“中国将来实现三民主义之后，也是向

---

① 《中苏关系》，第 27 页。

② 同上，第 35—36 页。

③ 《中苏关系》，第 4 页。

这个理想前进”<sup>①</sup>。可见,孙科此时思想是相当进步,这恐怕是他亲苏的一个内在原因。

第三,孙科亲自争取苏援使他加深了对苏联的认识。如前所述,孙科在抗战期间曾两度访苏、争取苏援,苏联的慷慨援助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1938年5月19日,孙科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谈时曾说到这一点。他说,他深为感激苏联的友好援助;而他访问英法(孙科3—5月曾顺便去过这两个国家)却“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他“只好听完同情中国的许多保证,但这一问题没有下文”<sup>②</sup>。这必然使孙科更感到苏联的亲善友好。1939年孙科第二次访苏期间又去过法国,也谈到这种感受。他在回答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关于苏联给中国多少物资援助的问题时说,援助是相当大的,而且肯定要比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大的多<sup>③</sup>。这就是比较的作用。而且通过访苏的实地考察,孙科“发现苏俄是在经济和工业复兴中充满新精神的国家。在那个国家中,人民显得心满意足;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sup>④</sup>这也会使孙科感到苏联既是一个友好的又是一个富有实力的国家,联苏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

第四、战时同盟关系的制约。孙科认为,抗战前中国有三条外交路线可走,一是亲英、美,二是亲苏联,三是亲轴心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只有亲英、美、苏一条外交路线了,因轴心国是敌人,英、美、苏已团结合作,亲英、美就非同时亲苏联不可。这种观点显然是从战时大同盟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不可说没有道理。当然,这种道理更多地还是表现在理论上。从实际上看,蒋介石在同盟内部也是划分亲疏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的外交政策确以亲苏为主,因

---

① 同上,第7页。

②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G·C·斯托莫尼亚科夫同中国立法院长孙科会谈记录》(1938年5月1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第277页。

③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3卷,第511页。

④ 同上,第69页。

为此时国际援助主要来自苏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大量援华，取代了苏联的位置，蒋美关系便迅速升温，而中苏关系却逐渐冷漠。可见，蒋并非从同盟关系的一般道理上看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以援助来作为外交关系的准绳的。孙科则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在1944年7月7日纪念抗战7周年发表的《我们唯一的路线》一文中，就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有些人认为只要获得英美的援助，即可争取抗战的胜利，也有些人认为亲苏便不能亲美英，他们的认识都是错误的。”<sup>①</sup> 孙科谈了三点理由：苏联过去援华作战和现在英、美援华作战没有什么不同；不久英、美、苏还要在战场上共同作战；战后英、美、苏要一起建设世界的和平。所以只亲英、美而不亲苏，那真是“愚不可及”。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孙科在抗战期间始终奉行亲苏政策。由此可以说，孙科是同盟利益的维护者。不过，也应看到，孙科对同盟的作用估计有些过高，其实同盟内部始终存在矛盾的，特别是在美苏之间；而且这种同盟是以战时作为前提条件的，大战结束后，同盟便趋于瓦解。因此，以同盟关系为出发点的同时亲英、美、苏的政策不可能真正而持久地实行下去。然而，孙科的这种主张对发展战时中苏关系无疑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责任编辑：宋士堂）

（作者王真，1949年生，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副教授）

---

① 《中苏关系》，第50页。